

民進黨政商博弈研究

朱松嶺 著

台湾研究

民进党政商博弈研究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进党政商博弈研究 / 朱松岭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108-1061-9

I. ①民… II. ①朱… III. ①民进党-政策-研究
IV. ①D675.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3142 号

民进党政商博弈研究

作 者	朱松岭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2.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061-9
定 价	32.00 元

自序

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已鸣枪开战。民进党摩拳擦掌，力图在此次选举中实现第二次政党轮替。尤为重要的是，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的竞选班底以陈水扁执政时期的幕僚、官员等为主，这就使得我们要从不同侧面分析历史上民进党选举的种种行径。民进党与商界的博弈则是其谋求选举胜利的一种方式。分析民进党这一侧面，或能对研究未来民进党政商关系走向有一定学术价值。

本书从台湾政治与经济问题的纠结入手，分析了2008年以前民进党与商界博弈的相关问题。选举是台湾政治生活的核心，选举是台湾政党为了赢得政治斗争的胜利、上台执政的主要渠道。选举要筹集经费，商界同其他界别一样都会为选举投入政治献金，而选后商界又企望当选的政党给予政治回馈。这种复杂的政商关系对台湾政局走势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景有着重要的影响。民进党作为台湾年轻的政党，迅速执政又迅速下野，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这个政党从反商开始，到政商合流；从阻止两岸经济合作到默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背后有着政治问题经济考量和政治问题政治考量的双重蕴含。本书从民进党所谓反“黑金”开始，分析了民进党复杂的政商构造、本质和后果，指出民进党调整与商界关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赢得选举，是“一切为了权力”！

笔者认为，本书所阐述的民进党与商界博弈，虽不能从全景上展现民进党与商界的关系，但起码能从一个侧面显现出民进党的相关政策与实践，为未来的方家们研究民进党这支台湾政坛上不容忽视的力量做点基本的资料搜集、整理和提升，以减轻他们在研究中的某些繁琐工作。

本书最早构思于2005年，成稿于2006年12月，修订于2011年6月。那一时期，正值陈水扁第二任期，民进党处于微妙的调整时期。那时，陈水扁当局的一系列调整岛内经济政策及两岸经济政策的措施引起了我们的关

注，并认为有必要对民进党的政商关系做进一步的梳理和理论探讨。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又是以民进党研究为特色，撰写这样一本书，有着相对便利的研究条件。为此，我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徐锋博士就准备策划这样一个选题，并进行深入研究，这一选题得到了人民出版社王世勇博士的支持。此后，我们开始搜集资料，撰写初稿。初稿由我撰写，由徐锋博士修改。后来此稿经历三次修改，都包含着徐锋博士的深邃思想和血汗辛劳。由于种种原因，此书直到 2011 年付梓。出版时，徐锋博士认为自己的专业领域不在台湾研究，对此仅是业余爱好，坚持不署姓名，成为本书幕后的英雄。徐锋博士是我多年的挚友，他的姓名没有署在本书上，但是他已署在品格与友谊的常青树上！

本书聚沙成器，成书的过程极为艰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创院院长徐博东教授的悉心指导，得到国台办新闻局副局长、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范丽青教授的关照、批评与建议，得到台湾研究界诸多专家学者和台湾学界众多先进的资料支持、批评指正。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陈星博士百忙中抽出时间对本书进行校对。在此，对上述诸前辈、诸位同行好友表示诚挚的感谢！

在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九州出版社的支持，责任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 录

自 序

绪论 民进党治下台湾政治与经济问题的纠结	(1)
一、经济问题的政治解决：商界及其党性	(5)
二、政治问题的经济权衡：政党及其政策	(8)
三、权与利的角逐：政客、商人及其交往	(12)
第一章 民进党政商关系的模板：李登辉治下的黑金政治	(15)
第一节 李登辉治下的黑金政治与现阶段	
民进党的白金政治	(15)
一、何谓黑金政治？何谓白金政治？	(16)
二、黑金政治与白金政治的比较	(17)
三、理清民进党的政商关系必须从它的模板入手	(18)
第二节 李登辉时期黑金政治泛滥的原因	(18)
一、李登辉时期黑金政治泛滥的原因	(19)
二、李登辉时期的黑金政治是国民党“保卫政权”的必然结果	(25)
第三节 十年之痒：李登辉、国民党与黑金政治	(27)
一、利用党产搞金权结合	(27)
二、利用地方派系搞黑金政治	(28)
三、饮鸩止渴的黑金操作最终使国民党政权垮台	(30)
第四节 热衷白金的民进党：必然走向腐败的政党？	(31)
一、民进党克隆了威权时期的国民党	(31)
二、民进党也有选举压力	(33)
三、民进党部分政客的人格与李登辉相去不远	(34)

第二章 反黑金、政商关系与民进党上台执政	(36)
第一节 品牌的塑造：清廉的民进党与黑金的国民党	(37)
一、本土 + 民主 = 清廉的民进党？	(38)
二、外来 + 威权 = 黑金的国民党	(41)
三、民进党政治理念中的偏执和误导	(44)
第二节 政治上的攻势：明反黑金、暗结善缘	(48)
一、表演性的政治：明修栈道反黑金	(49)
二、务实性的政治：暗度陈仓结善缘	(52)
第三节 政党的轮替：黑金未落幕，白金已登场	(56)
一、2000 年“大选”的概况	(57)
二、导致 2000 年台湾政党轮替的因由	(59)
三、民进党对权力和腐败的全面接收	(63)
第三章 民进党内派系、政客及其与商界的关系	(70)
第一节 派系共治的民进党	(70)
一、民进党派系发展脉络与变迁	(70)
二、民进党派系的新发展	(75)
第二节 民进党主要派系的政商关系	(80)
一、“正义连线”与商界的关系	(82)
二、“福利国连线”与商界的关系	(89)
三、“新潮流系”与商界的关系	(94)
第三节 政商关系对派系关系和民进党利益的影响	(96)
一、党内初选和派系冲突	(96)
二、陈水扁对“执政”资源的控制和分割	(99)
第四章 民进党政商关系的构造、本质及后果	(104)
第一节 民进党政商关系的要素：选票与钞票	(104)
一、选举民主与台湾不成熟的选举	(104)
二、选举是台湾政党与商界的联结点	(107)
第二节 民进党政商关系权力寻租的本质：选票与	

钞票的互换	(116)
第三节 民进党扭曲的经济政策及其对商界的影响	(126)
一、民进党上台后应对商界诉求的经济政策选择	(126)
二、民进党关于两岸经贸问题的政策选择及其与商界关系	(133)
第五章 民进党与商界的权利博弈	(139)
第一节 商界的整体利益与民进党的政策导向	(140)
一、台湾经济发展现状与民进党两岸经贸政策的失败	(141)
二、拼选举还是拼经济：政党和商界的分歧	(145)
第二节 民进党商界政策与商界态度的转变	(148)
一、民进党商界政策内涵的矛盾	(149)
二、民进党产业政策口惠而实不至	(150)
三、商界主流对民进党态度的转变	(154)
第三节 民进党与商界博弈的焦点：权力还是利益	(156)
一、民进党一切只为自己执政	(157)
二、商界的终极目标与代理人的挑选	(159)
第六章 陈水扁的家族弊案与民进党的堕落	(162)
第一节 堕落之源：民进党的转型与陈水扁的专权	(162)
一、派系共治还是一人独断	(162)
二、陈水扁聚敛、巩固独裁权力的其他措施	(169)
第二节 陈水扁家族弊案	(173)
一、高捷弊案	(175)
二、SOGO 弊案	(178)
三、台开内线交易案	(182)
四、“国务机要费”案	(183)
第三节 “倒扁”与“护扁”：台湾利益政治的 表现与走向	(186)
结语 权与利的角逐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190)

绪论 民进党治下台湾政治与经济问题的纠结

2000年，台湾首次实现了政党轮替。民进党从在野党上升为“执政党”以后，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纠结一直是民进党当局面临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在2006年春天总爆发，引发了民进党政治上空前的危机，并成为民进党2008年下野的一个重要原因。

选举是台湾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选举是台湾政党赢得政治市场、上台执政的主要渠道。选举需要经费，政党及其政客们自然会有金钱的需求，商界人士自然也会投其所好，通过政治献金谋取自己的经济好处。当前台湾的政商关系和“戒严”时期有所不同。“戒严”时期，台湾的权力与财力是分开持有的。因此，在政治市场上，财团一般不会直接出面，而是躲在背后，通过代理人寻求权力的庇护。“戒严”解除以后，台湾商界、政界人士几乎毫不避讳两者间的交易。这就使台湾以选举为枢纽的政商关系发展到明目张胆的地步。

以选举为枢纽的政商关系是指政界和商界通过选举联结在一起，政党、政治人物通过选举获取权力，通过主导政策来回馈商界利益、满足商界需要的金权互动结构、过程及其结果的总和。一些台湾政客以社会公共资源为酬庸，广泛编织政商人脉，千方百计地服务于支持他的商界人士。而部分商界人士则是通过政治献金为政党或政治人物提供较好的参选条件和获取权力的机会，以此来实现自己获利的目的。总之，是用钱搞权，用权换钱。这样，台湾的选举实际上成了利益集团侵夺台湾人民资源的手段。

虽然台湾号称“民主灯塔”，但其政治社会尚处于民主化后的失序状态，规则的缺失和混乱使政党沦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表，这严重影响到台湾人民的福祉。

在权与利的角逐中，民进党的表现并非它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清流、高

尚。民进党一直都是根据选举的需要不断变化自己对商界的态度，以获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党外时期开始，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民进党重视劳工利益和环保诉求，故而对资方权益持批判态度，对大资产阶级更是持排斥立场。当时，民进党认为大资产阶级、大财团是国民党统治的基础，也是国民党治下最大获益者。大资产阶级、大财团利用种种官商结合的方式，获取大量的超额利润，大量侵夺台湾普通民众的利益，导致台湾出现日渐严重的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立足于这一判断，民进党便以中产阶级和工农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自居，在政策上清晰地表明仇视大资产阶级的姿态。

民进党深知，在李登辉的统驭下，国民党为了胜选而诉诸与黑金勾结的做法最终将引火烧身。为此，他们更是起劲地标榜自身改革、清廉的形象，刻意保持与大资产阶级、大财团之间的距离，并采取措施避免自己陷入黑金的泥沼。通过反黑金，民进党成功地将所有不满于国民党统治的力量紧密地团结在自己周围。但是，基于夺权目的的阶段性、策略性反商立场也使民进党早期与商界之间存在极深的隔阂，双方缺少起码的互信基础。商界、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大财团对民进党“反商”的刻板认识有着极深的印象，与民进党关系比较紧张（当然，少数持有“台独”理念的商人是不在此列的）。得不到商界的认同和支持与深陷政商勾结的泥沼有着同样严重的政治后果，那就是始终无法获致冲刺执政地位的实力。于是，民进党开始检讨既往，调整政策，寻求与商界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民进党在与商界关系的变化经历了如下的关键阶段：

首先是1994年底的台湾县市长选举，它标志着民进党与商界关系转型的开始。1994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使民进党初尝与大财团尤其是本省籍大财团结盟的甜头，自此它对商界的态度就有了极大的转变。1995年，民进党主动寻求与商界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大财团发展各种关系。比如，通过会议、餐会或者工商恳谈会等台湾岛内常用的方式，寻求和大资产阶级、大财团的和解。1997年，民进党获得岛内地方县市长选举的突破性胜利，政治影响力骤增，已居“准执政党”的地位。在全面审视迅速夺取“中央执政权”的可能性以后，民进党开始寻求争取更多企业、社会团体和商界人物的支持，来分化统治阶层并赢得政权。1998年4月，民进党举办了建党以

来的首次“产业政策研讨会”,^① 特别邀请岛内工商界人士参与, 申明“民进党不反商”的立场。虽然这次会议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 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民进党与商界的交流, 为其以后制定出工商界认同的经济政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民进党实力的上升和“执政”欲望扩张, 随着国民党对政权控制能力的减弱, 民进党和商界都开始重新思考彼此之间的关系。民进党执政可能性越来越大, 善于投机的人们开始追加向民进党及其政客们的投资。2000年“总统”大选中, 许多大财团的负责人更是公开为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出面说话, 借以影响选民判断和选票走势, 这也是陈水扁之所以能够侥幸当选的原因之一。

民进党高层深知, 他们的政治地位及前途都高度仰赖商界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大财团的捐输, 自己虽然执政了, 但却也因此背负了沉重的人情债, 而这笔债是必需还的。2000年, 民进党获取执政地位, 启动了与商界关系的第二次转型, 使岛内政商关系出现解构和重构。政党上台后, 本应致力于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的目标, 但民进党当局误判台湾民意与两岸形势, 置民生幸福与公共利益于不顾, 弃“清廉”、“反黑金”等目标于脑后, 一味地推行其“台独”路线, 并诡称这是在迎合台湾民众的意愿。陈水扁无视改善两岸关系、发展社会经济的需求, 将其战略目标定为“去中国化”。对于与商界的关系, 他采取两手策略: 一是不开放两岸“三通”、阻挠两岸交流, 不给岛内企业到大陆发展的更大空间; 二是以给予政治酬庸的方式继续维持与政商的互动关系。由于不愿意松绑台商最关注的两岸经贸关系, 所以政治酬庸、利益输送就成为民进党政商关系最主要的板块。又由于现阶段台湾的政党政治生态并非规范有序、民进党领导人也并非自诩的那般清廉自守, 所以政商勾结、“白金政治”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甚至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赶超李登辉时代黑金政治的苗头。

李登辉时期, 几次“修宪”的结果是使台湾政治体制向一个超级“总统制”倾斜。由于“执政党”、“立法院”、“行政院”都无法对“总统”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 “总统”可以任意将“行政体制”庞大的外围事业机构与附属财团法人机构数以千计的职位作为酬佣性任命或者分赃活动的筹码而

^① 参见鞠海涛著:《民进党社会基础研究》, 九州出版社, 2004年1月版, 第51-53页。

不必付任何相应的责任。所以，自那时起，台湾政商关系就因制度和规则的缺失而越来越金权化、恶质化。李登辉主政时，出于个人利害的考虑，并没有严格地规范选举经费与政治献金，这就为财团认养政治人物提供了可乘之机。刻意经营政商关系的财团就其行业分布而言，多集中在在房地产、建筑、电信、运输、银行或保险业，这些领域基本都是非贸易性的，最有能力从消费者与出口产业赚取超额利润，^①而赚取超额利润的终南捷径就是紧抱政客的大腿，充分借助、利用制度与规范的缺失。于是，恶质的政商关系几乎不可避免。

2004年台湾“大选”启动了民进党与商界关系的第三次转型。陈水扁执政四年，拼经济无方，尽管选前大肆玩弄“台独牌”、“公投绑大选”，但还是难言内心的危机感、末日感。日暮途穷的民进党当局开始疯狂地捞取民脂民膏。依靠枪击案勉强维持的陈水扁当局在继续标榜自己本土政权的背后，更加明目张胆地推行金权政治，于是，当局选择性办案、政策性执法，民主政治被庸俗化到极致。从2004年至2008年民进党下台，在民进党本土政权的招牌下，以权谋私、借权玩法的不胜枚举。民进党治下政商勾结的混沌局面引起岛内社会资源的分配极其不公，产业经营环境急剧恶化。

民进党政绩乏善可陈，弊案却连续不断。2006年以来，陈水扁夫人吴淑珍、其婿赵建铭一家贪腐问题浮上水面。贪污腐化、利益输送，陈水扁周围的亲朋故旧、亲信部属滥用公权、政商勾结、疯狂掠夺，着实让全台湾百姓惊心动魄。人们看到，短短六年间，一个号称“清廉、勤政、爱乡土”的党，一个以反腐败、反黑金为旗号击败了国民党的党，其腐败和张狂的程度又远远超过被它打垮了的政党。民进党弊案被揭，既是陈水扁人格的破产，也是民进党政治的破产。

民进党和商界关系的演变让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如下的问题：一、民进党内派系、政客与商界的关系究竟如何？二、正常的政商关系应该怎样？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民主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与台湾有何不同，为什么？三、民进党何以会从“反黑金”走向“黑金”政治？四、政商关系在岛内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如何？五、政商关系对两岸关系有怎样的影响？我们应该

^① 陈萃：《台湾新政商关系透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2年第4期，第87页。

如何理性的思考这些问题？等等。

在民主国家或者地区，政党充当了国家和政府之间的挡风墙角色，政党和商界之间的互动都有规范的制度约束。但是，台湾民进党当局和商界之间的互动是没有什么规范、制度可言的（尤其是“政治献金法”公布之前）。因为它们本来就是拿不到桌面上来的东西，它们始终隐藏在非正式的黑幕之后。笔者曾在2005年4月当面问过民进党前副秘书长钟佳宾。他明确地讲，民进党和商界没有制度上的交流机制，也没有明确的交流方针。这就为民进党内的执政集团用非正式方式和商界进行互动，以谋求其私利创造了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王建民研究员认为，政党与商界的关系本身就十分复杂，在台湾尤其复杂。政党与商界关系不仅是指政党与大企业或财团的利益合作关系，只要涉及到政党，其政治人物与企业、团体、组织之间的利益交换与合作都可以概括在内。政党及其成员和商界的关系本身就具有相当程度的隐蔽性，私下的利益交换非经披露不得而知。所以，要全面、细致地把握民进党与商界的关系，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为此，本书试图从一般理论角度入手尽可能地接近民进党政商关系的本来面貌。本书将着重结合以下问题来实现上述目的：

一、经济问题的政治解决：商界及其党性

台湾商界与世界接轨早，发育比较全面。在中西方文化、经济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台湾商界形成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可以用经济问题的政治解决来简略地概括台湾商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式。这一方式既有其特殊性，也体现商界活动的一般规律。从一般性的角度来看，经济问题政治解决的方式是由商界自身固有的党性所决定的。

台湾商界具有商界共有的党性，那就是：商界以获取利润为最根本目的。在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商界又要维护既得利益，并且预留和拓展预期利益的空间。对利益的追逐使得商界很自然地寻求政治上，尤其是政策上的支持。为了获取这种支撑，商界必须有自己明确的、成功的利益表达，因此商界也有自己的政党倾向，有直接的政治属性。商界的党性从根本上取决于利益诉求。为了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商界要特别注意影响政党与政府的政策活动并使之服务于自己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商界所有的活

动，包括其直接或者间接参与政治的活动，都服从于“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

应当指出，商界在政治上的诉求并不意味着商界因此而成为一贯的、直接的政治活动主体。商界的主要关注对象和主要活动基本上都在经济领域以及与经济所能辐射到的政治领域。只有当他们感到有必要参与政治和影响政策时，他们才将其一部分心力投放到政治领域；只有当他们痛感政策的制定与制度设计攸关他们的生死存亡时，他们才可能直接、深度地介入政治和影响政策。商界对政治力量的利益需求是遵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制度成本较低的情况下，正常的政商关系是政治、政党与商界两行不悖的良性关系，无所谓孰高孰下、孰先孰后。但在制度成本极高的情况下，政商关系是纠缠不清、极不正常的。商界和政治力量各执一端，既相互利用又彼此冲突，以致出现政策的反复和经济的波动。在后一种情况下，商界的党性、商界对政治活动的参与往往就更加直接和露骨。

台湾商界寻求经济问题的政治解决也与台湾政治的特质有着密切的联系。

孙中山先生认为，政治是众人之事。现代政治根本不同于古代政治的地方就在于：古代政治大多是以君主专制独裁的方式来处理众人之事，结果众人之事实际上成了独裁者的私事；现代政治则是公民以委托权力的方式实现自治，通过代议政治和政党政治来管理公共事务。因此，有没有政党、政党政治机能的发挥是否顺畅就显得极为关键。相应地，政党自身的品质如何也就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包括政党在内的政治团体内部有三种人。第一种是领袖。他们对内掌握着团体内的全部资源，对外则代表团体与外部团体作资源交换。第二种是中层人员。他们是上下联系的纽带，其资源主要在团体内部，能够从局部获取有限资源但不能从整体上控制全部资源。第三种是底层人员。他们关系松散，与前面的两种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他们因而对团体既依赖又疏离。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他们存有在团队内获得提升的希望，希望从中得到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如若获取资源的可能性消失，他们就可能寻求抗争并走向团体的反面。

政党内部这三类人谋求权力的目标往往有所不同。民主社会里，公民选

择政党并赋予其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因此政党内部所有的这三类人当然应当共同致力于公共事务。但是，因为人本身都有凭借公权谋取私利的可能，这就使得政党的公共目标和党内不同的私人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和冲突。紧张与冲突的最终结果有三种情形。第一，政党所有行为都是为了实现公共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制度设计的初衷是能够实现的。第二种，政党所有行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致力于实现公共目标，另一部分致力于实现私人目标。这会导致政党在政治上的平庸。第三种，将党处在为公共目标所设定的位置上，却完全服务于私人目标。这一定会招致排山倒海式的腐败。

由于在实现公共目标和私人目标之间存在紧张和冲突，所以原本中性的公共权力往往会被政党、政客滥用，而商界则往往会利用这一点来寻求经济问题的政治解决。商界在确定好战略目标以后，会在战术上利用政党政治固有的矛盾，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或者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以从中牟取利益。明白地讲，商界是在充分利用上述三类人中尤其是前两类人在目标选择上的矛盾，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这就是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和公权力介入企业个体问题的关键所在。

台湾商界寻求经济问题解决的方式有着明显的东亚地区性和中国的民族性。在东亚，尤其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皇权的统治的结果是国家以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垄断了所有社会财富的分配，控制了一切谋利渠道。正如《管子》中所讲的：“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① 传统政治正是通过这种“利出一孔”的方式强化政治对经济和社会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形成了几千年来“官本位”的传统。官越大，利越厚，官位、权力、财富形成“三位一体”架构。在这一架构下，官位是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权力则成了财富的代名词。权力甚至比货币更具有流动性、更方便于交换。这样一种特殊的、扭曲的社会形态，必然会导致投机政治比直接从事经济活能够

① 《管子·国蓄》。

更好更快地聚敛财富。^①

近现代以来，东亚地区市场经济的发育基本上是在外来压力的逼迫下，由政治力量的主导和推动而形成的。东亚国家市场经济及现代化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制度创设与积累，都是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下人为抉择的结果，并非如西方社会那样是原生的。这使东亚地区政高于商，政优于商的传统不仅没有立即被解构和重构，反而得以延续和强化。这样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决定了商界在解决问题时，往往希望借助于政治力量。谁背后的政治势力强，谁获取的资源就多，谁获取的政策优势就多，谁就能在商业竞争中处于优势，并能够继续长期主导政策，以获取源源不断的来自于公权的支持，从而使自己的企业永续发展。台湾商界充斥着通过经济问题政治解决而发展起来的例证。从晚清开始直至今天，在台湾形成、存续的许多大家族，最富有的如辜氏家族、蔡万霖家族、林氏家族、许文龙家族等等，无一不是依托与政治势力的结盟、借助政商关系的运营来发家、发展和壮大的。

由于上述原因以及台湾商界自身的特点，商界人士，除个别企业家因理念原因投放给政治人物或政党资金以外，大多数基本上都是采取两面押宝的方式。因为企业的大小不同及从事的行业不同，商界所表现出来的党性倾向、政治赌注的大小及收益也都有所不同。一些巨商和政界的互动频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操控政客。而一般中小企业，则处于被政界领导、引导的层面。

二、政治问题的经济权衡：政党及其政策

作为上层建筑，任何政治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在选举社会中，任何政治问题往往都要归结到赢得选举、巩固选举成果的层面来进行。政党及其候选人赢得选举，巩固其选举成果，一般需要大量的政治捐献和选票支持来实现。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政治献金和选票支持，政党需要制定有吸引力的政策。安东尼·唐斯在其《民主的经济学理论》一书中说，“民主政治中的政党类似于追逐经济利益的企业家，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制定他们认为能够得到最多选票的政策，正如企业家为了同样的理由生产他们认为能够得到最多

^① 徐慧君：《管仲陷阱——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载史记365TM网站。

利润的产品一样。”^① 对于政党来说，推出合适的政党候选人，把正确的竞选战略、竞选营销和竞选策划三者完美结合是赢得一场选举的完美结合的产物。^②

现代政党针对商界的利益考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企业可以为政党及其候选人提供丰厚的政治献金，使政党顺利完成选举过程。美国政治学家普塞特认为，“在现代的人和民主制度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都是通过政党来表达的。”^③ 有学者认为，从历史角度讲，选举是促使政党出现的主要诱因。^④ 由此可见，选举实际上是社会上各方利益主体寻求代理人并为其提供资源支撑，以及国家中各种政治力量提出政治承诺并寻求这种资源支撑的主体市场。

政党在获取商界政治献金时往往会考量以下三层递进关系：第一层也是最终要和最基本的关系，即利益关系；第二层是为实现利益要求而形成的结盟与反对关系；第三层是整体上主导或影响利益格局的政治权力关系。这三方面的考量揭示了选举政治的重要法门就是利益和利益交换。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在这一点上，思想家、政治家和商人都有着高度的共识。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没有利益的政治，也不存在没有政治的利益。所要摆平的，只是两者间的关系，以及对这一关系的定格——制度与政策安排。政党要充当联系社会和公权力的纽带和桥梁，它的使命就在于把公众的偏好变成政府的政策。为此，它要有选择地、有区别地对待各方面的利益，寻找、整合并服务于与自己存续的基础、方向尽可能一致的利益要求。为此，对于一些政党来说，拥抱企业，尤其是大财团往往是其最佳的选择和捷径。

（二）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细胞。它们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而且也吸纳了数量极多的劳动力。所以企业本身即掌握大量选票。

选票的确是经由选民之手投出去，但选民投票的倾向性往往受到工作场

① A.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57, pp295-296.

② 参见张文生、王茹著：《民进党选举策略研究》，九州出版社，2004年3月版。

③ [美] 西摩马丁·里塞普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第204页。

④ 黄嘉树、程瑞著：《台湾选举研究》，九州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41页。